

为红学一辩

应必诚 著

——红学为何，红学何为



为红学一辩

——红学为何 红学何为

应必诚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红学一辩——红学为何,红学何为/应必诚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9-10210-9

I. 为… II. 应… III. 红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4280 号

为红学一辩——红学为何,红学何为
应必诚 著
责任编辑/邵 丹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65 千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210-9/I · 813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片说明

本书插图均取自清·改琦的《红楼梦图咏》。

改琦，字伯韞，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山人、玉壶仙叟、百蕴生，生于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卒于道光九年（一八二九）。松江（今上海市）人。改琦的身世遭际与曹雪芹颇为相似。他出身富贵人家，祖父因有战功，乾隆特恩加赠一品，但到了改琦中年，家道中落，最后只能以鬻画授徒终其一生。他的坎坷经历，使他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对红楼人物及其命运产生强烈的共鸣。在绘画历史上，改琦是最早用绘画来表现《红楼梦》人物的画家之一。他的《红楼梦》人物画，运用传统的单线白描手法，用笔细秀，蕴藉雅逸，形神兼备，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

目 录

一	3
二	16
三	31
四	70
五	100
六	108
七	124
八	160
后记	169

红学为何？红学何为？对“红学”意义的追问和探寻，贯串在整个“红学”研究的历史之中。虽然历史上的各个红学派别各有其地位和意义，而且他们之间也有过激烈的争论，逞辩逞才，各执一词，自谓独得红楼真谛，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红楼梦》之外去追寻《红楼梦》的意义，而且愈演愈烈，以致“红学”不是阐发《红楼梦》的意义，反而遮蔽了《红楼梦》的意义。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红学为何”、“红学何为”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红学为何”、“红学何为”，这也是每一个从事红学

研究的人都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而且只要你从事红学研究，即使你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什么，但在你的研究实践中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隐含着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我们应提倡自觉的学术精神，反思红学的历史和现状，追问和探寻红学的意义，努力对“红学为何”、“红学何为”作出符合实际的回答。

当然，当前特别提出“红学为何”、“红学何为”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自然与周汝昌先生有关。在红学研究者中间，至少表现在文字上，大概只有周汝昌先生高度自觉地提出“红学为何”、“红学何为”两个问题，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明确的回答。我这篇文章既是和周先生继续展开讨论，也是对“红学为何”和“红学何为”的进一步的追问和探寻。希望得到红学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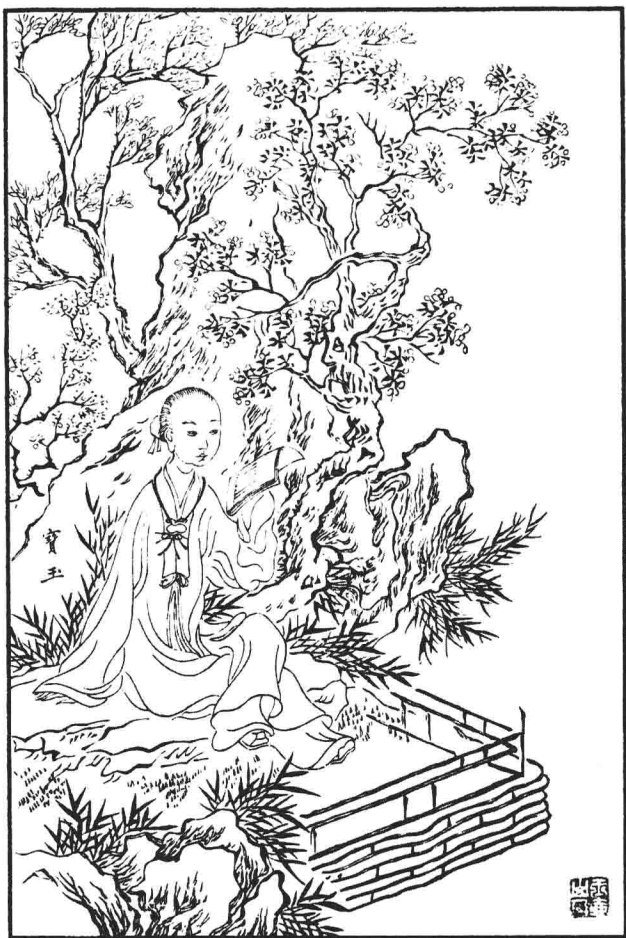
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汝昌先生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什么是红学》。在这篇文章中，他对“红学”作出明确的界定。他认为“红学”以曹学为中心，包括版本学、脂学、探佚学等专学，简称“四学”，而把“《红楼梦》研究”排斥在“红学”之外。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我认为作者、版本等文献考证研究与《红楼梦》作品研究是统一红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红学”就是《红楼梦》研究。

周汝昌先生发表了答辩文章，题目是《“红学”和“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认

为“红学”与“《红楼梦》研究”是两回事。为了使大家明白他的意思，他用了一个很生动很形象的比喻，他把所说的“红学”，也就是曹学为中心的版本学、脂学、探佚学等专学与“《红楼梦》研究”，比作一个耘麦，一个植桑；一个修路，一个盖房。

接着，北大教授赵齐平先生发表题为《我看红学》的文章，也不同意周先生提出的观点。此后《文艺报》虽然没有继续集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由于这个问题涵盖了整个《红楼梦》的研究，也是每个红学研究者都要回答的问题，难以回避，所以讨论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没有中断过。周汝昌先生也不断发表相关的文章，论述和发挥他的观点，回答他的对话者，批评他的批评者。

周汝昌先生用什么来为自己“红学为何”的观点辩护呢？他拿“莎学”说事。他说他“上世纪四十年代‘负笈’燕园时，读的是西语系，所以也很迷莎学，下



寶玉

过工夫，知道莎学内容也是考作者、辨版本，二者是此一专学的根本与命脉，没听说世界学者有什么不然或异议。可是事情一到中国的‘红学’，麻烦就大了。”于是感叹道：“难道‘红学’是‘中’学就不能与‘西’学同日而语吗？”^①

如果“莎学”如周汝昌先生所说仅仅是考作者、辨版本，排斥对莎士比亚伟大剧作和诗歌的研究，为什么“中”学的“红学”一定要与“西”学的“莎学”“同日而语”呢？我以为不必去“同日而语”。对于“西”学，我们只能吸取其中好的，而不能无选择地加以接受。问题更在于，“莎学”是否就如周汝昌先生所说仅仅限于辨作者、考版本呢？不是。周汝昌先生对“莎学”的理解及其历史的知识很不全面。概括地说，“莎学”的发展经过漫长历史过程，对莎学历史阶段的划分，不同的

^① 周汝昌：《善察能悟刘心武》，载《文学报》2007年11月23日。



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根据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介绍比较简要的一种，如下：最初的主流“莎学”确是作者和作品版本的考证，我们姑且称之为“莎学”的考证学派。这一点，莎士比亚和曹雪芹有些相似，他的剧本的著作权和版本都存在着争论，甚至有没有莎士比亚这个人也有人提出怀疑。所以，作者和版本研究最先被提到莎学的研究日程上来。但即使是这个阶段，不少思想家、学者和作家也发表了重要的研究莎氏剧本和诗作的论文，他们是琼生、德莱登、柯勒律治、莱辛、歌德、海涅、伏尔泰、雨果、马克思等人，这些论文同样是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以后莎学研究中产生了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到了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潮的背景下，文学批评和研究在英美出现了“新批评派”思潮。这个思潮以作者思想与作品的思想不一致为理由，提出“意图谬误”等一系列的观点，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作者完成作品的一刻他就死

了，割断作者与作品的联系，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文本研究，并提出了细读和研究文本的一整套方法。这个思潮促使莎学研究的转向，形成新的“莎学”流派，我们可称它为“莎学”的新批评派，并且很快地代替了考证学派的主流地位。这个学派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有重要的贡献，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它的主流地位后来就被莎学的历史文化学派所取代。接着，莎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就日趋多元化。从以上对莎学研究历史的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周汝昌先生接触到的仅仅是“莎学”的考证学派，并把它当作“莎学”的全部，这严重地限制了他的理论视野。打个比方，就如同一个学子，访学京华，向周汝昌先生学习“红学”，如果他只听周汝昌先生讲什么是红学，没有在京城里到处走走，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中国艺术研究院、去北京的高校听听那里的红学专家是怎么讲的，那么他所知道的“红学”也就是作者和版本考证，就是红学四学，这是



黛玉

一样的道理。可见，用“西”学的“莎学”证明“中”学的“红学”只包括辨作者、考版本之类，不包括《红楼梦》作品研究的观点是建立在对西学莎学极端片面了解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难以成立的。

周汝昌先生接着发出感慨：“考作者、辨版本是世界诸大文学巨人不朽名作研究过程中绝无例外的，也是没有异议的。唯独到了中国的‘红学’上，一涉及考作者、辨版本这种世界性的普遍研究工作就被视为是什么‘不研究作品本身’、‘不研究文学创作’、‘光是考证祖宗八代’的过失，甚或是一种错误，这就令人费解了。”^①

首先，这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前面我已经指出“新批评派”就以作品一旦发表就是脱离作者，并以作者的思想与作品的思想不一致为由，排斥对作者的研究。这个流派在英美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竟统治了

^① 周汝昌：《善察能悟刘心武》，载《文学报》2007年11月23日。



三四十年，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文—文学思潮之一，怎么能够说“绝无例外”、“没有异议”呢？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你不能说这样的观点是不存在的，更不能以此作为立论的事实依据。

其次，这样的说法偷换了讨论的论题。我们什么时候说过红学研究不需要考作者、辨版本呢？没有。我们不赞成的是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界定，把“红学”限制在考作者、辨版本等范围内，而绝不是要反对作者、版本等文献的考证。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周先生不过是通过偷换论题把不赞成他的红学四学的观点统统说成是反对“考作者、辨版本这种世界性的普遍研究工作”而已。

再次，作者、版本等文献的发掘、考证、研究和《红楼梦》作品研究是统一红学研究的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献考证并非新红学派所专有，不能说谁从事红学文献考证，谁就是新红学派。一个从事《红楼梦》作

者、版本的文献发掘考证、研究的学者完全可以对新红学派采取保留和批评的态度；同样，不赞成新红学及其观念的研究者对新红学派红学文献发掘、研究的成果也可以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肯定他们的贡献，即便他们的成果与“自叙说”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只要它合乎事实，对我们阅读、分析、研究《红楼梦》有所帮助，我们还可以把它剥离开来，对它们进行新的科学的解释。红学考证的价值，俞平伯先生早就说过：“考证含义广，作用多，并不限于自传说，这不过其中之一而已。即摒弃自传说，而考证之功用故自若也。将后四十回从一百廿回中分出为考证的成果，与其人同时主张自传说并无必然之联系，不宜混为一谈，考证之功，不掩自传之累。纵使自传说不成立，而残编与续貂，其泾渭玉石之辨，仍昭然在人耳目。”^①

① 俞平伯：《索隐与自传说闲评》，载《俞平伯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48 页。